



季莫费耶夫和美帝国主义

日共《赤旗报》評論員文章



人 民 出 版 社



季莫費耶夫和美帝国主义

对于他对《肯尼迪和美帝国主义》
一文的反駁的批判

日共《赤旗报》評論員文章

(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六日)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六五年·北京

ナ・チモフェーエフとアメリカ帝国主義

《ケネディとアメリカ帝国主義》

にたいする反論の批判

根據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六日「赤旗報」譯出

季莫費耶夫和美帝国主义

日共《赤旗報》評論員文章

•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陽門內大街320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1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张 $2\frac{3}{8}$ · 字数 52,000

1965年6月第1版

1965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統一書号 3001·892 定价（四）0.21元

統一書號：3001·892

定 價： 0.21 元

目 录

一、季莫費耶夫的反駁的整个特点	2
二、赫魯曉夫是否同美帝国主义进行了斗争	5
三、帝国主义者的内部矛盾和利用这种矛盾的問題	13
四、追随肯尼迪、約翰遜的政策	21
(1) 肯尼迪的“开明”是什么	22
(2) 是約翰遜，还是戈德华特	31
(3) 誣蔑反法西斯統一战綫策略	35
五、所謂“新托洛茨基主义”的誣蔑	43
(1) 三种歪曲	46
(2) 改良主义与革命的观点	50
(3) 現在还有“主要打击德、法帝国主义的論調”	56
六、革命的乐观主义和机会主义的“乐观主义”	62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政治理論杂志《共产党人》第十二期（一九六四年八月出版），刊登了季莫費耶夫写的一篇题为《真反帝和假反帝》的文章。这是他对我們党一九六四年三月十日在《赤旗报》上发表的評論員文章《肯尼迪和美帝国主义》进行的反扑。

《肯尼迪和美帝国主义》这篇文章系統地批判了現代修正主义把一九六三年十一月被暗杀的前美国总统肯尼迪当作和平的政治家并公开为美帝国主义塗脂抹粉的机会主义理論，同时全面地揭露了肯尼迪的“两手政策”的本质，并且闡明了这种“两手政策”的实际情况。因为上述机会主义論調实际上对日本以及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和民主运动产生了有害的影响，而克服其影响已經成为当前的迫切任务，所以我們才发表了那篇文章。而且那篇文章根本没有公开指名譴責苏联共产党。但是，《共产党人》杂志編輯部在完全没有向苏联国内介紹《肯尼迪和美帝国主义》这篇文章的情况下，就說什麼“这篇文章批判了苏联的对外政策方針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綫”，“对各兄弟党进行了毫无根据的指責，說它們‘试图回避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从而单方面地发表了反批判的文章，并且公然对我們党的《赤旗报》編輯部极尽攻击之能事，說它采取了“新托洛茨基主义”的立場。

这首先意味着，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政治理論杂志自己招认，以赫魯曉夫为首的苏联共产党领导最近几年来采取的对外政策和方針，恰恰是評論員文章所批判的那种理論和政策。如果

自己覺察不到這一點，那就不至於連《肯尼迪和美帝國主義》那篇文章也不向國內介紹，就如此盛氣凌人地提出反駁。我們黨的評論員文章，正是挖到了以赫魯曉夫為首的國際現代修正主義潮流的病根。

第二，那篇反駁文章意味着，季莫費耶夫和《共產黨人》編輯部反對《赤旗報》評論員文章所提出的科學的批判，企圖頑固地維護錯誤的美化美帝國主義的論調，向我們黨的《赤旗報》編輯部挑起了公開論戰。受到公開攻擊的人有權提出公開反駁。圍繞《肯尼迪和美帝國主義》一文的討論成為蘇聯共產黨和日本共產黨之間的公開論戰的一部分，其責任完全在於《共產黨人》編輯部和季莫費耶夫。

一、季莫費耶夫的反駁的整個特點

首先必須指出季莫費耶夫的反駁的整個特點。

我們黨的評論員文章《肯尼迪和美帝國主義》，是為了正確地徹底維護八十一個兄弟黨一致通過的《莫斯科聲明》的革命路線而發表的，文章的內容如下：

第一，文章指出了成為某些馬克思主義者美化肯尼迪的理論基礎的“美帝國主義向兩翼分化的論調”，並且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對此進行了詳盡的分析和系統的批判。文章從事實和理論兩個方面反復闡明了下述這樣一點，即把肯尼迪作為謀求“和平共處”的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明智派”而加以美化的言論，歸根結蒂是從根本上修正了列寧關於帝國主義的論斷，是要說明美帝國主義的本性已經改變，這只能是最卑鄙無恥的投降主義的理論。

第二，文章指出了錯誤的“主要打击德、法帝国主义的論調”，认为这是美化肯尼迪的另一个理論基础，它是同国际上的共同課題，即究竟怎样来看主要敌人的問題有联系的。文章詳尽地闡明，“主要打击德、法帝国主义的論調”也不过是“向两翼分化的論調”的发展，只不过是回避同“世界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机会主义的理論而已。

第三，文章談到了肯尼迪的“两手政策”，并且用具体的事实证实和揭露：这种政策只不过是帝国主义者为了同一个目的而使用的两种手法而已，它是現阶段的美帝国主义为了应付自己所陷入的严重危机而采取的政策。从本质上来說，它是帝国主义者用“和平”和“进步”的假面具打扮起来的、极端富于侵略性的反击政策。

第四，文章根据事实分析了肯尼迪的“两手政策”通过“古巴危机”和部分禁止核試驗条約，并在美苏間“緩和紧张局势”这种政策的假象背后，形成一条加紧推行“遏制中国”和侵略亚洲的政策的路綫的經過，并且揭露了当前美帝国主义的政策和策略。

第五，文章肯定了約翰逊政府基本上是继承了肯尼迪的路綫，指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产生的不团结現象所造成的复杂而困难的形势，并且呼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根据《宣言》和《声明》的精神，正确地统一对美帝国主义的評價以及对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的評價。指出了《怎样評價美帝国主义是当代区别馬克思列宁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主要分水岭》这篇文章，就是这样总结了日本共产党和日本人民的斗争經驗，同时呼吁粉碎現代修正主义者背离《宣言》和《声明》的路綫、帮助美化美帝国主义的那种背叛性的为帝国主义辯解的論調，并且呼吁全世界人民加强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如果这篇文章的观点有不充分之处，所搜集的事实尚有不足

或者叙述有欠妥当之处，我們当然衷心欢迎从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場出发給我們指出来。因为这样一种批評是創造性的和建設性的，通过这样的討論，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

但是，令人非常遺憾的是，坦率地說，季莫費耶夫的反駁文章，同上述那种創造性的和建設性的討論是背道而馳的。

第一，他的反駁文章，尽管从本质上来說，不是提出部分的反駁而是提出根本性的反駁，但仅仅是在用詞方面語气强硬激烈，然而，它甚至連从根本上提出反駁时所必需的那种最起码的資格都不具备。这一点表現在，他对上面扼要地归納出来的評論員文章的最重要的五个論点，沒有努力认真地一一加以回答。仅仅以第一点对“向两翼分化的論調”进行的批判为主，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彈美化肯尼迪的老調，对第二点“主要打击德、法帝国主义的論調”，只是一笔带过。至于对我們在第三点和第四点上就肯尼迪推行的“两手政策”所进行的历史性的具体分析，几乎沒有进行具体的反駁，只是泛泛地談了談肯尼迪政策的特点。如果季莫費耶夫要提出反駁，我們就希望他提出更有內容的、更全面的反駁。

第二，他的反駁文章，甚至在他提出的那些論点方面，都沒有充分理解評論員文章的观点和理論；它所提出的大部分的反駁，都是一些在評論員的文章里已經有了答案的东西。而且，其他部分，也都是依靠歪曲和捏造評論員文章的观点的手法来进行批評的，这是最低級的爭論。如果要認真地进行爭論，就必須很好地理解对方的論点，圍繞对方在理論方面提出的主張的最重要的中心問題，通过可靠的論证来进行。我們希望季莫費耶夫能够进行更有論据的、更科学的爭論。

第三，他的反駁文章，与其說是进行理論上的反批判，不如說

只是急于給別人扣政治帽子而已。他除了給評論員和《赤旗報》編輯部扣上了“中國共產黨的擁護者”這個大家熟悉的帽子之外，還扣上了經常重複提到的“新托洛茨基分子的計劃”以及“對阻止世界核戰爭的運動採取抵制態度”、“積極的反蘇主義”、“反列寧的民族主義”等等極端誣蔑性的帽子。如果季莫費耶夫多少還想在科學的基礎上進行討論，那麼，我們希望他在談論對方的論點時，能夠選擇足以正確地表達對方觀點的理論特點和政治特點的措詞。蘇聯共產黨的同志一給別人扣上一頂帽子就會產生某種影響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但是，不管季莫費耶夫採取什麼態度，我們還是要儘可能準確地理解他的觀點，並且抓住他的最重要的論點，對他所代表的修正主義理論提出反批評。

二、赫魯曉夫是否同美帝國主義 進行了鬥爭

季莫費耶夫首先以《不要歪曲問題的實質》為題，說他與《赤旗報》評論員的主張不同，並且斷言問題的實質“不在於反對或不反對美帝國主義。”據他說，進行這種鬥爭，對於全世界共產黨人來說，是“沒有問題”的、不說也很清楚的事，當然，對蘇聯共產黨來說，也是不言自明的。但是，當季莫費耶夫搬出蘇聯政府面對革命的古巴的保衛、面對帝國主義在塞浦路斯的陰謀和美國軍隊在“東京灣”進行挑釁活動時所採取的行動，來證明同美帝國主義進行鬥爭的“蘇聯堅定的原則性立場”的時候，蘇聯的對外政策究竟是否對美帝國主義展開了堅決鬥爭，這決不是不說也很清楚的事。

不客气地说，我們对于引用这些例子，特别是引用古巴事件和“东京湾”事件，来证明苏联的“原則性立場”这一点，不能不感到非常惊讶。因为一九六二年秋天的“古巴危机”，是赫魯曉夫在历史上留下来的、采取双重无原則态度的典型事例。他为了防止美帝国主义对古巴的侵略，要使美帝国主义者“更现实地感到热核战争的危險”（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在苏联最高苏維埃會議上的报告》），就把这作为直接的目的，把核导弹运进古巴，从而犯了冒險主义的錯誤；接着，他忽而一变，同意无视古巴主权的“国际觀察”，从而又犯了投降主义的錯誤。

赫魯曉夫违背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原則性立場——核武器在本质上防御武器，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首先使用它——輕率地揮舞了社会主义的核武器。結果，他在肯尼迪的挑畔面前，即在肯尼迪一面根据所謂“灵活反应战略”在全世界范围内对苏联加紧实行核訛詐，一面企图首先用常规武器进攻、开始侵略古巴这样一种挑畔面前陷于困境，最后悲惨地屈服于美帝国主义的核訛詐。

而且还因为，苏联在一九六四年夏天发生的“东京湾”事件中采取的行动，是这样一种记忆犹新的无原則态度：赫魯曉夫口头上指責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动，但在实际上却不顾苏联是日內瓦會議两主席之一，无视日內瓦協議，把問題提到联合国，事实上給美帝国主义的阴谋帮了忙。季莫費耶夫所引用的赫魯曉夫在吉尔吉斯共和国的讲话，只不过是赫魯曉夫的这种无原則的投降在全世界人們面前暴露出来以后，为了掩盖其投降主义而进行的軟弱无力的裝飾門面的演讲而已。

如果季莫費耶夫硬要强辯，把苏联政府在赫魯曉夫领导下，在古巴，在发生“东京湾”事件时所采取的行动說成是“原則性立場”的話，那么，那样的“原則”，只能是对社会主义和馬克思列宁主义

的侮辱。

如果季莫費耶夫希望我們舉出實例證明，那麼我們不僅可以舉出上述兩件事實，而且還可以大量地舉出赫魯曉夫企圖回避而且實際上已經回避同美帝國主義的鬥爭的言行。例如，赫魯曉夫在一九五九年訪美時，頌揚艾森豪威爾總統是美帝國主義堅固的“明智派”的領袖，說他“真誠希望消除‘冷戰’狀態，建立我們兩國的正常關係，促進各國間關係的改善”（一九五九年九月在莫斯科所作的訪美歸來的報告）；赫魯曉夫還不斷地宣揚“戴維營精神”，開始宣傳“美蘇合作”。由於一九六〇年五月U—2型飛機事件，同艾森豪威爾總統的合作成為不可能以後，赫魯曉夫這次又把希望寄托在新總統肯尼迪身上。他頌揚肯尼迪是“清醒地考慮了現實情況”的“明智派”的代表（《評肯尼迪在美利堅大學的演說》），一直奔向“美蘇合作”的道路。在“和平的政治家”肯尼迪死後，赫魯曉夫一面更加頌揚死去的肯尼迪，一面開始列舉美國總統約翰遜、國務卿腊斯克和參議院議員富布賴特等人的名字，說他們是繼承肯尼迪的“和平共處”路線的、有“清醒的見解”和“現實感”的政治家（在匈牙利包爾紹德化學聯合企業發表的演說）。赫魯曉夫的這些言行，不是美化美帝國主義和代表美帝國主義的總統、在人民中間散布對美帝國主義和美國政府的荒謬的幻想，又是什么呢？

一九六三年，赫魯曉夫完全違反全世界的和平民主力量關於禁止核試驗和核武器的要求，屈服於肯尼迪和麥克米倫的主張，簽訂了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他自吹自擂地頌揚這個條約，說它會“促進國際緊張局勢的普遍緩和”，“為解決時機業已成熟的國際問題創造有利的形勢”，“為解決根本的問題，即全面徹底裁軍問題开辟道路”（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七日答《真理報》和《消息報》記者問）。在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簽訂一周年，正好是“東京灣”事件發

生的第二天，赫魯曉夫極力強調“保障”由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產生的“信任的積蓄”，並且“千方百計地鞏固和擴大它”。（莫斯科條約簽訂一周年答《真理報》和《消息報》記者）兩天後，頌揚美帝國主義的這番話言猶在耳，美帝國主義就對越南民主共和國進行了兇極惡的轟炸。赫魯曉夫的這些言行，難道不正是掩蓋和美化美帝國主義推行核戰爭政策和侵略政策的凶惡的真面目，隱瞞那個主要目的在於使美帝國主義永遠保持核壟斷並且阻止蘇聯以外的社會主義國家加強防禦力量的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的本質嗎？

赫魯曉夫把今天的世界比喻為“好象是生活在一個充滿熱核武器的火藥庫上”（《在蘇聯最高蘇維埃會議上的報告》），宣揚他推行的以“和平共處”為名而同美帝國主義實行無原則合作的政策，說這是人類謀求生存的唯一辦法。而且，他一直攻擊說，那些不贊成他這種以“核戰爭毀滅人類的論調”為依據的“美蘇合作”的人，統統是“通過戰爭取得社會主義勝利的這種所謂理論的擁護者”，並且要“在世界文化中心的廢墟上、在荒無人迹的和被熱核尘埃染污的土地上建立共產主義文明”。（《在德國統一社會黨第六次代表大會上的講話》）但是，他的“和平共處”論，難道不正是屈服於美帝國主義的核訛詐，只把防止美蘇戰爭看成是超過一切的“頭等重要任務”，並且使一切革命運動、民族解放運動都服從於他的“美蘇合作”政策，把世界革命的命運寄託在美蘇之間的經濟競賽的結果上，最後削弱反對美帝國主義的戰爭政策和侵略政策的鬥爭，從而危及和平嗎？

事實勝於雄辯。赫魯曉夫的外交政策有著數不勝數的事例，可以證明赫魯曉夫回避同美帝國主義進行鬥爭，不論季莫費耶夫怎樣辯護，也是徒勞。

我們黨已經發表的題為《論赫魯曉夫的“和平共處”路線的本

质》的評論員文章(見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赤旗報》),分析了赫魯曉夫的這種“和平共處”路線的本質和實際情況。關於這篇文章,我們希望季莫費耶夫研究一下,究竟赫魯曉夫是同美帝國主義進行了鬥爭,還是沒有進行鬥爭?季莫費耶夫作為問題提出來的“不是在口頭上,而是在實際上進行反對以美國為首的世界帝國主義的鬥爭”的是誰?不論在口頭上或者在實際上,都沒有進行鬥爭的又是誰?包括赫魯曉夫下台這一事實以內的历史,已經就這個問題作了嚴厲的裁判。

季莫費耶夫把蘇聯的對外政策作了如下的規定:

“大家知道,蘇聯奉行積極、靈活的愛好和平的對外政策,謀求緩和國際緊張局勢,促使**帝國主義、首先是美帝國主義的最富於侵略性的集團遭到孤立**”。(黑體是引者用的)

但是,在“使帝國主義的最富於侵略性的集團遭到孤立”這樣一個乍看起來似乎很有道理的詞句的掩蓋下,把美帝國主義分成“最富於侵略性的集團”和並非如此的集團的兩類,把肯尼迪和約翰遜等人看成是後者的代表,替他們開脫罪責,這種美化肯尼迪的做法,正是《肯尼迪和美帝國主義》一文所要批判的對象。

季莫費耶夫又把今天的反帝鬥爭的內容作了如下的規定:

“今天,如果**不是在口頭上,而是在實際上進行反對以美國為首的世界帝國主義的鬥爭**,那麼,這首先**意味着加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威力和國防威力,成功地建設新社會**;這就意味着加強我們時代的所有革命、反帝力量的團結。”(黑體是引者用的)

他首先在這裡譏諷我們似乎只是“在口頭上”同帝國主義進行鬥爭,而把這同“在實際上進行鬥爭的做法”對立起來。當然,不是在口頭上而是在實際上同帝國主義進行鬥爭,是一個最重要的問題,這是不消說的。然而,在這個實際鬥爭中也必須包括“在口頭

上”正确地进行斗争。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須經常地最大限度地利用語言和文字，彻底地揭露帝国主义的本质、它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的实质以及它的一切阴谋詭計，以提高广大的人民群众的觉悟，武装他們的思想。《莫斯科声明》說：

“今天，为和平而斗争，就是保持最大的警惕性，不倦地揭露帝国主义的政策，警觉地注視战争挑撥者的阴谋詭計，喚起世界人民对那些坚持战争方針的人的神圣憤怒，提高一切爱好和平力量的組織性，不断加强群众保卫和平的积极行动，加强同一切不願意有新战争的国家合作。”（《莫斯科宣言·莫斯科声明》，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三年版，第五八頁）

季莫費耶夫等人故作姿态地強調不要在口头上而要在实际上进行斗争。这种說法才是在实际上反对《声明》的这一革命观点，它貶低“不倦地揭露帝国主义的政策，警觉地注視战争挑撥者的阴谋詭計”（《莫斯科声明》）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一切“語言”和一切宣传鼓动的意义，企图使他們在这方面表现的苟且偷安的立場合法化。

作为这一点的证据，只要看一下他想怎样“在实际上”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就更加明白了。也就是說，如果按照字面的意思来理解他的主张，就是不去揭露帝国主义，而首先为“加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經濟威力和国防威力”而埋头工作。这就是他所主张的最重要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我們已經領教过了在赫魯曉夫的指揮下演奏的縮小世界革命力量的三部曲：第一，把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三种主要革命力量——世界社会主义体系、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階級和人民的革命运动、被压迫国家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事实上縮小为只剩下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第二，把这个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事实上縮小为苏联一个国家；第三，把这个苏联所要起的作用事

實上縮小為只剩下“共產主義建設的勝利”。請看，他們就是這樣違反《宣言》和《聲明》，把聯合世界人民反對國際帝國主義的力量這一任務縮小成為這樣一個任務：爭取蘇聯一個國家的“共產主義建設的勝利”以及為此而集結一切贊同蘇聯路線的力量。事實上是把國際規模的反帝鬥爭歪曲成為“美蘇合作”下的兩個體系的經濟競賽。而且，對於批判和反對他們的錯誤路線的人，正如季莫費耶夫所作的那樣，照例加以譴責，說“他們顯然在追求狹隘民族主義的目的”，“把蘇聯的成就同其他國家勞動人民的革命、反帝鬥爭的利益對立起來”，“反映他們對社會主義的力量最終戰勝資本主義喪失信心”，等等。而他們的這種主張，也正是我們黨的評論員文章作為嚴重問題而批判過的那個無原則的“和平共處”論。

的確，季莫費耶夫在談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的內容時，也談到了“一切革命力量和反帝力量的團結”。但是，既然不揭露帝國主義而拚命宣揚“美蘇合作”的政策，又怎麼能夠“團結”“一切革命力量和反帝力量”呢？季莫費耶夫的這些詞句，道道地地地是只限於“在口頭上”，而他“在實際上”是擁護赫魯曉夫的親帝國主義路線，即在蘇聯一國“建設共產主義”，為了保證這一點而建立“美蘇合作”體制，並為此而集結“反帝力量”。這不是很明顯的嗎！

如果談到和平共處，那麼，我們黨是一貫支持《宣言》和《聲明》中所規定的“不同社會制度國家間的和平共處”的。我們黨在一九六一年七月召開的第八次代表大會所通過的綱領自不用說，就是在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召開的第九次黨代表大會所通過的中央委員會報告、《我們黨的當前要求》中，也明確地寫着“保卫亞洲和世界和平，爭取不同社會制度國家間的和平共處的任务”。同時，我們黨一貫堅持了不妥協的鬥爭，反對一切試圖歪曲原來的正確的和平共處政策，把它改變為不同帝國主義的戰爭政策和侵略政策進行

斗争，而屈服于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的那种无原则的妥协政策。我们党忠实地遵守《宣言》和《声明》的原则规定，为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侵略政策和民族压迫政策，为维护和平而进行了斗争。正是我们党为维护原来的正确的和平共处政策而进行了斗争。而正是投降美帝国主义的、无原则地追求“美苏合作”的赫鲁晓夫，背叛了原来的正确的和平共处政策。

只要不是在口头上，而是真正实际地考察一下这几年来来的国际形势的现实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引起争论的事实，就会明白季莫费耶夫等人所说的分歧的实质“不”在于“反对或不反对美帝国主义”，“这是没有问题的”之类的主张，显然是一种骗人的鬼话。不管季莫费耶夫等人打算怎样支吾其词，这里问题的实质在于如何评价美帝国主义以及怎样同它进行斗争。这是很明白的，而且是众所周知的。

季莫费耶夫却千方百计地回避这一点，并且提出了下述的论点：

“实际上，今天中共领导人及其为数不多的追随者同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之间的分水岭，与其说是对美帝国主义的‘评价’，倒不如说是对当前世界发展的根本问题抱有不同态度。这些问题包括战争与和平问题，资本主义国家里的革命工人运动的战略和策略问题，当代所有革命力量的相互作用问题。在所有这些问题上，北京的领导人及其在《红旗报》编辑部里的支持者都离开了协商一致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

对于把我们党说成是中国共产党的追随者这种谴责，我们党中央委员会在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六日给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复信里，已经充分地予以驳斥。这显然是诬蔑性的攻击。但是，问题并不仅仅在于对帝国主义的“评价”，而且联系到象季莫费